

## 2019年散文:

# 时代的情感轨迹与美学景观

□王清辉

怎样描画出自己的认知轨迹,表达出自己独到的思想感情方式,是散文写作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在2019年的散文阅读中,我们看到了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印记,作家们运用质地丰富的精神世界,自信、自觉地面对历史文化现场的嬗变和张力,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历史之间建立起更新的联系。支撑这些情感和认知的,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以及随着这些变迁而不断变化的我们精神世界的全部。2019年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开放的发展态势,我们从中读到如指纹一般质地的记忆与时代,如河流一样宽广的现实与心灵,如前路一样发展的创造与反思,连同所有这些写作本身,也正在创造着属于散文自身的美学。

### 时代的指纹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散文创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或从自我出发,将自己的脚步与祖国前进的步伐相联系,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与我们民族的精神史相镜照,呈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樊锦诗的《厮守一眼千年》、于魁智的《与祖国同行 与京剧同辉》、周令钊的《为新中国而设计》等写自己亲历的生活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他们将自己的事业奉献给人民,他们的生命与祖国同在,在他们平淡、从容的文字中,我们能读到荡气回肠而又温情似水的珍贵年华,并从中感知到自己的血脉流淌。

贺捷生的《么姨的灿烂年华》用真切感人的笔调,回望真实而曲折的历史,既饱含崇高、坚定的信念,又宽厚温暖,就像我们的父辈、祖辈们走过的红色岁月,因他们的赴汤蹈火而光芒灿烂。梁衡的《将军几死却永生》用简洁的笔触描画出张自忠将军的一生,折射出大历史的变幻莫测。金仁顺的《高丽和我》、次仁罗布的《就这样被牵绊》等为悠久的民族传统和广阔的历史画卷提供了真诚、直观的美学镜像。

一般作为写作背景出现的生活环境,在散文写作中,也常常被赋予成为实体性的存在。叶兆言的《南京传》以南京建城为起点,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递进,描绘了南京城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在城市的兴废与时代的嬗变之间,在丰厚的文化景观和幽微的历史经验中,南京作为传主的精神魂魄凸显出来,我们从中读到的不仅是南京,而且是整个中国历史变动中的恒常与坚守。程程的《家住百万庄》用干净、内敛的语言敏锐地观察到百万庄小区在悠长时光中的变与不变,交

织在时光中的记忆能唤起人最大的共鸣。韩小蕙的《协和大院》写协和医院的人与事,着力勾画和彰显“协和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

亲人间的经历和遭际最能孕育感悟,常常成为散文写作的丰富源泉,其中有关生与死、希望与绝望、命运与苦难的诘问,作为厚重的背景,有力地烘托和映照这一主题。陈福民的《与你遥遥相望》中的母亲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一生由失败拼凑而成,固执地相信贫困与真诚和美德之间有神秘的关系,这个并不是超人的母亲形象却分明让我们读到了作者的赤子之心。孙郁的《劳我一生》、无为的《我和父亲未解的心结》等都执著于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说是困惑。只有凭借时间的力量,慢慢积攒起对人的复杂性的更多的体认,才有可能慢慢将宽容、理解编织进爱的纽带。

同样母题的作品中,陆庆屹的《四个春天》让我们看到久违的最简单朴实、最日常生活、但是也是最动人的温情。他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在2019年初上映,记录了四个春节期间他和父母在贵州独山县的生活日常。同名书《四个春天》可看作是电影的补白或是注脚,里面那对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多才多艺、幽默达观的《我爸》《我妈》,他们家庭中的诗意,感动之余让人觉得余味无穷。

### 心灵的河流

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散文通过看世界、观自我,成为写作者的精神和心灵来路的见证,它帮助我们驱散焦虑、澄明信念,所以散文里常常是一面倾诉、一面反思。实际上,在这些追求的背后都藏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秘密:为了了解自己。

贾樟柯在《穿越乡村的时间》里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文学是什么、文学和电影、文学与时代和自己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这是一位电影导演的朴素告白:文学是我们与世界相处的共情方式和思维方法,也是我们确认真实的自我、保存自我记忆的途径。同样抓住自我与故乡、乡村的关系展开记忆追溯与思考的,还有孙慧芬的《在故乡识别安详》、南帆的“村庄笔记”系列专栏、刘亮程的《月亮在叫》、刘琼的《格桑花姿态势势》、黑孩的《故乡在路上》、林纾英的《大椿树》等。

刘汀的《东北偏北》则另辟蹊径,写的是他个人“与东北的发生学和交往史”,这样个人化的东北形象写作,与其说是在写作为地域文化的东北,不如说是写出了作者个人对东北的复杂感

情。龙仁青的《他乡故知是麻雀》通过留鸟指代城市化进程中的“进城”和“留乡”。不仅立意新颖写法考究,最终落脚到麻雀是人人的“他乡故知”,令人心生暖意。袁凌的《寂静的孩子》关注于留守、随迁、失学、单亲等当下儿童所面临的种种不幸,读完令人久久不能平静。作者通过冷静的笔触和辽阔的视角,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未来的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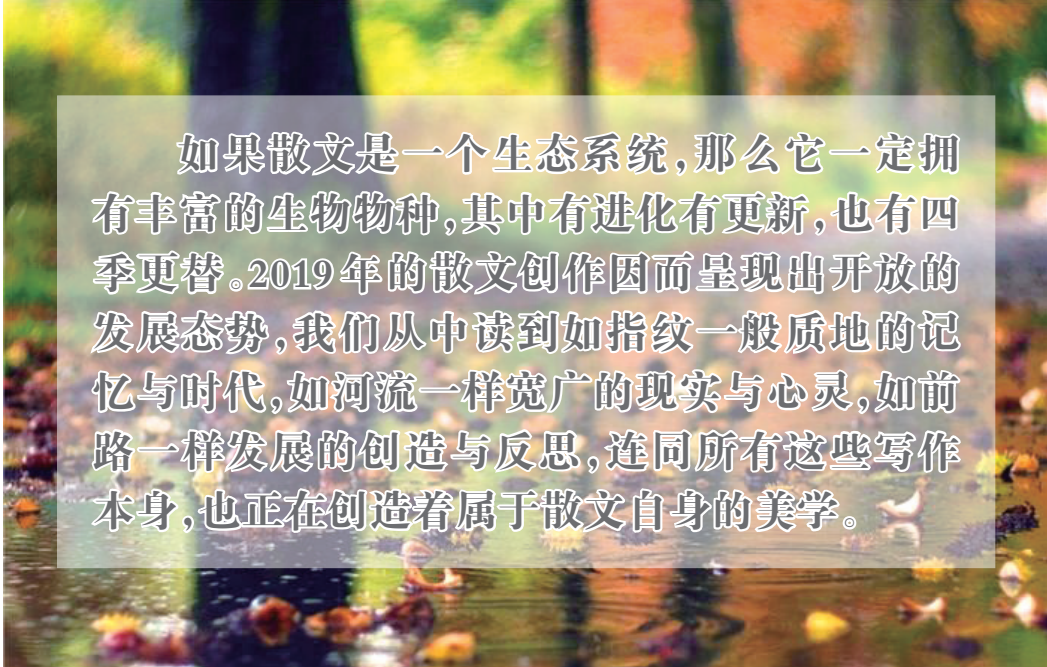
小说家关于文学创作的反思以及在创作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既是珍贵的第一手文学史料,也常常是耐读的好文章。2019年,王安忆的《成长初始革命年》、刘醒龙的《文学回忆录》、张翎的《废墟曾经辉煌》、张怡微的《旧日的静定》等,都是很好的范例。它们中有的围绕着祖辈故乡的往事来回探访,打开一个个时代的褶皱;有的通过细腻的见闻和翔实的回忆,串起百样人生;有的剖开自己经历中感触最深的部分,冷静地反刍自己的人生之路……这些回望与思考本身就是心灵和生命的闪光,我们从中读到情谊、读到趣味,也读到寂寞和一些难以言喻的人生滋味。

英国作家扶霞·邓洛普在《鱼翅与花椒》中认为,饮食在中国社会和历史中有着超然的核心地位,因此也成为了她观察中国历史、哲学、思想和生活的一扇绝佳窗口。而反过来,我们熟悉的各式中国菜肴通过她的观察,又成为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一份特殊的记录。葛亮的《好吃记》开篇就说“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作者从自己的童年记忆、写作经验、阅读经验入手,论及乡情、人情、人性、乡村与城市的角逐等关键性问题,从食物辐射到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场内容充实的自我辨析。

崔曼莉的《小白传》活色生香地讲述小区里流浪猫的命运。作者喟叹,无论个性如何,命运如何安排,无论是猫还是人,大家都在努力地生活。文章中如笔记小说式的细节更令人难忘,从中也可一见作者的笔力。《苏东坡,你走过多远的路》是我在微信公众号里读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作者根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网站上所收录的信息,看到了苏轼的人生行迹,发现苏轼几乎踏遍了宋朝的所有疆域。当我们面对苏轼一生中所走过的地图重读他的诗文,也许同样能获得更多的现场感和新鲜的见解。

### 创造的前路

海纳百川、无所不包本应该是散文的雄心,



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在散文中写出广阔的生活本身,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面向。比如《文艺研究》杂志2019年专辟“随笔体”栏目,希望“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评论本身也可以是散文,但这样的思考和语言方式都给散文写作在变化的方向上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从现代思想意识的层面上来说接续起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此外,《问彼嵩洛》这部定位为“中原访古笔记”的多人合集作品,作者均是文史、考古、美术等专业的青年学者,旨在挖掘从嵩山到洛阳这条路线上的古迹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展开具有独特学术价值和趣味的讨论。这样的尝试也许结果还不够令人满意,但是在写作方向上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此外,以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为代表的基层劳动者作家,他们的散文创作也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新鲜记录。文学写作从来都不是专业作家的“专利”,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可以参与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来。他们在劳动之余写作,用自己的感情和经历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特别是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文学创作让这些漂泊在城乡之间的劳动者拥有了一个文学的港湾,与此同时,进城打工这种流动迁徙的生活本身,也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局限于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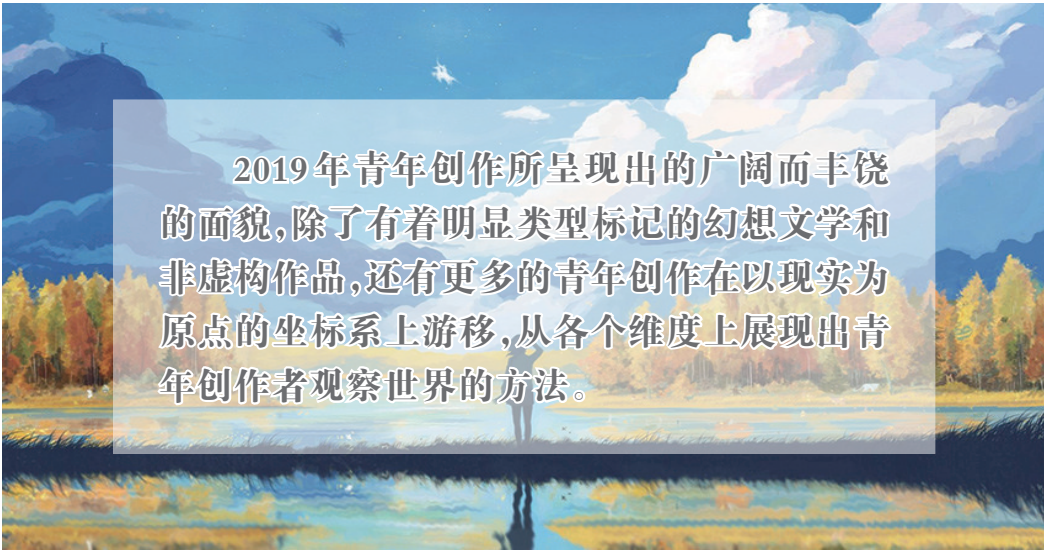
一村一地的封闭环境,而是能够在一个大的坐标系上看清自己的生活境遇,发出植根于自己生活的呼喊。基层劳动者作家的散文创作一方面是其生活状况的真实再现,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写作者向传统文学、经典文学乃至别一种生活方式、生存状态靠拢的努力。此外,劳动者作家的散文作品不光具有文学价值,我们都责任以文学的名义把时代和个体的经验记录呈现出来。每一个个人的书写加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全部的情感轨迹。

2019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鲁迅先生曾经评价说,五四之后,“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100年间的散文创作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艺术形式都在不断变化中前行,但是对时代的关注、对历史的省思、对文化的审视、对世相的洞察,是散文写作者共享的文体意识。无论笔法含蓄或者绮丽、缜密或是劲健,无论形式上繁复跌宕还是儒雅从容,或表现、或批评、或解释,都是从不同的面向与人生对话。在我的理解中,这就是散文的现实主义审美风貌的全部内容。如果散文是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它一定拥有丰富的生物物种,其中有进化有更新,也有四季更替。我希望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健康地良性循环发展,不断带给我们新的更多奇观。

## 2019年青年创作:

# 相遇在幻想与写实的两端

□刘秀林



坏变换颜色,因此,代表积极情绪的暖色在这里得到推崇,消极情绪带来的灰黑色则是一种恐怖和禁忌。小说主角周错是小镇上一个“心理按摩师”,负责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他,却渐渐掩饰不住失意和迷茫。随后,他发现身边很多人都成为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表面上的快乐只是一种必须的伪装。因为一个意外,周错又揭开了整个小镇的秘密:每一个能够感知情绪的积极砖块,都有一个灰黑色的内核。这个秘密引发了小镇的恐慌和骚乱,从前五彩斑斓的世界失去了颜色。小说最后,周错在混乱的人群中帮助了一个小女孩,这时,他们的脚下出现了灰黑色小镇上唯一一抹真正的亮色。这个画面颇具视觉冲击力,也彰显了一个很简单,却常常被有意忽视的道理:无论积极或消极,真实才是首要的、不可撼动的前提。

借助强大的隐喻和象征,寓言往往能够出其不意地击中某些问题。《积极砖块》之外,林塔源的神童与录音机》、陈春成的《传彩笔》也都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质。《神童与录音机》里有一个失去了天赋的天才小男孩,他的父亲无法接受这件事,坚持用录音机播放儿子从前背诵古诗的录音,希望以此唤回他过目不忘的能力。《传彩笔》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博尔赫斯式的嵌套故事:“我”认识一个资质平平却笔耕不辍的老作家,有一天

他突然停止了写作,直到去世也没继续,后来“我”偶然读到他的博客,里面记述了他如何在梦里得到一支笔,从此作文如有神助,但他写出来的每一个字只有自己能看见。两部小说都选择了以“空白”作为结束:小天才的父亲去音像店复制磁带,以求永久保存,可那竟只是一盘空空磁带;老作家的儿子告诉“我”,他找到父亲生前在写的那部“传世杰作”,发现里面所有的只是白纸。现代主义之后,“荒谬”成为一种美学,沿着既定的轨道,青年写作者很容易滑行至此,但是,只有指向更具体的现实,才能赋予一种美学坚实的底子。

大头马的《全语言透镜》、王侃瑜的《语膜》都着眼于科幻小说里一个历久弥新的“巴别塔”问题,小说中的“透镜”或“语膜”是那个理想的翻译装置。不同的是,《全语言透镜》向上飞行,最终来到人类对“万物至理”的追寻,《语膜》则降落人间,让我们看到母语如何在现实和隐喻的双重意义上成为一对母子情感上的隔膜。这样的命题之下,人类共通的困境消弭了种族与国界之别,但是对于年轻的科幻小说家来说,如何在其中寻找本土科幻的独特位置,如何能在“伊莎”、“雅克”的世界里安放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是更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与《时光的祝福》类似,陈楸帆的《人生算法》也有关“时间”这一科幻母题。小说把目光落在了一个未来的潮汕农民身上,为了弥补那些关于家族、家庭和自我的缺憾,他一次次进入“轮回舱”,尝试去过不同的人生。可是,再精确的算法也无法将人生导向一个完美的结果,个人心智总是能够在其中产生干扰,让每一次的结局走向不可收拾。宝树的《退行者》则以一个“退因缘行咒”来逆转时间,在一次殃及全家的空难之后,“退行者”频频使用咒语返回过去,但命运的随机性让他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人生轨迹上。线性的时间往往关于记忆和历史,关于某些难以拆解的心结,幻想为我们提供了违抗时间的可能,却并不保证最终的和解和救赎。不过,也许正是在与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当下的意义得到了更深刻的省思。

周恺的长篇小说《苔》生长在波光诡谲的晚清四川,为我们撬开了时代和地域的缝隙,亮出里面压抑着的不可思议的情欲、暴力和生命力,而后,又放任时代的洪流将他们一一冲散。作者所依托的历史语境和地方色彩无疑是小说的现实逻辑所在,但人物的个性面貌却在强大的情节中稍显模糊,抽象为一个行动的符号。与科幻小说的漫无天际的想象力相比,历史小说的幻想更像是贴地飞行,需要作者更谨慎地寻找平衡。

如果幻想是对现实的某种抽象和折射,那么“非虚构”的终极旨趣显然是宣称自己为现实本身。至少,写作者在努力向它无限趋近。2019年,“非虚构”已然进入了青年写作者的视野,并为他们的写作撑起了一方天地。袁凌的《寂静的孩子》是历时4年探访而来的儿童档案,记录了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及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他们有的是留守或随迁儿童,有的生活在单亲家庭,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正在承受着病痛折磨……对于孩子来说,这些经历是无可逃避的,甚至是不堪回忆和无法言说的,是“寂静的”。可正如袁凌在此书序言中所说的,“一旦我们睁开眼睛和耳朵,会发现世界不再寂寥,布满了条条奔腾的瀑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滴泼溅的水珠。”其中的一章《没有故事的地方》记述了吉林省长春市郊区一所孤儿学校的日常,一个或开朗或安静的孩子背后,都藏着各自惊

心动魄的往事。而这些还要听睡前故事的孩子,甚至还未有意识去审判和衡量发生过的一切。在他们所遭遇的真实面前,任何“故事”都是单薄的、残忍的、不堪一击的,这个时候,“非虚构”的能量超越一切可能的虚构,让修辞和抒情、分析和诠释全都黯然失色。

这一年,几位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仍然是关注的焦点,作为方法的“东北”也引发了持续的讨论。双雪涛最新小说集《猎人》开始挣脱从前所深植的东北土壤,逐渐转向了零星分散的城市空间,其中《火星》《女儿》等篇目都遥遥接续了作者第一部小说《翅鬼》既有的奇幻线索,也可视为作者面临新问题所寻求的方法之变。相比之下,班宇的小说着重于营造一种“失意中的诗意”,小说语言也能够洗净与繁复、冷峻与幽默的边界上来去自如,极具辨识度。郑执的《蒙面卡罗食人记》还带着《仙症》里神秘而不失滑稽的气息,但整体而言不及后者的饱满和连贯。三位作家都来自沈阳市铁西区,不过细看他们各自的着力点,能发现三人已经在互不相交的路线上飞驰,“东北”可能只是一个渐趋模糊的大背景。

关于青年作家的地域书写,另一个常被提及的名字是王占黑。近两年,她的《空响炮》《街道英雄》两部小说集连续勾画出一部“民间爷叔生活史”,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上海”都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发表于2018年的《小花旦的故事》富有更鲜明的“上海”意味,小说结尾,离开上海去了广州的“小花旦”有了一个新艺名“上海宝贝”,简称“海宝”。而由《小花旦的故事》牵连出“全球寻找海宝大赛”,也许能显露出青年创作正在溢出文学边界的趋势。这并不是由小说到剧本再到影视的单向链条,而是文学正与某些更新的文化形式发生合纵连横,可能是我们所知的建筑、摇滚乐、装置艺术,也可能是脱口秀、辩论会,甚至是某些未成规模、未得到命名、但也的确能抓住青年的形式。

董夏青笔下的“新疆”从未真正限定她的写作,读她的小说,最终能看到的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和我们任何人一样,面临着无可逃避的抉择和变故,只不过,在没有掩体的戈壁和雪原上,这种碰撞尤为激烈,又尤为的稀松平常。《在阿吾斯奇》触碰的是军人之间、兄弟之间沉默、悠长却又转瞬即逝的情感。在硬碰硬的世界里,反而会有最柔软的东西激荡出来,久久令人感动。

整体而言,2019年青年创作所呈现出的广阔而丰饶的面貌,除了有着明显类型标记的幻想文学和非虚构作品,还有更多的青年创作在以现实为原点的坐标系上游移,从各个维度上展现出青年创作者观察世界的方法。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偏于幻想,还是近于写实,他们总会因为对现实的殷切关怀,相遇在某一个地方。